

【東亞研究述評】 East Asian Studies Reviews

地雖近而心漸遠
——十七世紀中葉以後的中國、朝鮮和日本
China, Korea and Japan since Mid-17th Century[§]

葛兆光 講演
Zhaoguang Ge
高翔飛 記錄*

§ 本文為二〇〇五年四月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的講演稿；這個題目在二〇〇五年十一月與十二月，並於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與東華大學歷史系分別講演過。

* 講演者為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記錄者為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學生。

壹、前言

今天我要向大家報告的，是一個有關亞洲或者說東亞的歷史與文化認同問題。爲什麼要講這個題目呢？是因爲就這個問題，近五、六年以來我一直跟國內外的一些朋友有爭論。記得二〇〇〇年我去日本，就和東京的一些日本朋友們討論這個問題了。到了二〇〇二年，我到臺灣開會，當時臺灣大學建立了「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作爲臺灣最重要的文科研究基地，那個時候，就有很多人講「東亞」或「亞洲」，所以，我在會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想像的，還是實際的——關於晚清民初日本與中國的「亞洲主義」論說》，後來也發表在《台大歷史學報》上。爲什麼要寫這篇文章呢？因爲很多人要把「亞洲」或者「東亞」當作一個研究空間，當作一個具有共同性、同一性的歷史空間來進行研究，但是他們並不追究這個「東亞」或者「亞洲」是否在歷史上、文化上一直就有認同，卻把它看成像老歐洲一樣，好像自然而然就是在歷史上、文化上有同一性似的，所以，有一些人主張建立亞洲的知識共同體和文化共同體，意思是與「歐洲」互爲他者，可是，我總覺得這種想法缺乏歷史感，所以，我就寫了那篇文章，會後我還曾經和出席會議的林毓生先生簡短地討論過。到了二〇〇三年，我去韓國參加大文化討論會，又和韓國學者有一些討論。一直到二〇〇五年一月份，我到東京大學文學部去演講，會上包括法學部的渡邊浩教授、文學部的末木文美士教授、小島毅、一橋大學的阪元宏子教授、東洋文化研究所的尾崎文昭教授等很有名的研究日本、研究中國的教授，都在一起跟我討論這個問題。最後，就是在二〇〇五年四月，東京大學在北京大學舉辦了一個「東京大學二〇〇五論壇」，這個論壇，最後讓我和渡邊浩教授進行了總結評論。於是，我又開始老調重彈，我發現，我的觀點可能使那些主張亞洲研究或者強調亞洲作爲一個共同體的朋友聽得不太愉快，但我認爲自己已經講的很委婉和客氣了。

以上就是我今天給大家講這個題目的時候，首先要和大家交代一下的背景。

貳、東亞或亞洲：想像的同一性與實際的差異性

大家知道，在中國學術界，大凡搞文化比較的人，所用的比較單位都有一個特點，就是「不是東就是西」，就是東方對西方。換句話說，我們一開始走的就是「東西文化之比較」這條路，從梁漱溟開始，而且，「東方」實際上就是中國，仔細想想，除了甲午戰爭之後的那幾年，在文化上，中國學界並不怎麼關心日本、朝鮮等其他國家，就像將他們當成褲腰上栓的小掛件似的，有沒有都無所謂。所以，中國一開始做的文化比較，總是「東」和「西」，或者「中」和「西」，不是「中體西用」，就是「西體中用」。所以，我們通常忽略的一個問題就是，至少在明清、在清代中期以前，中國的國際關係，真正有重要影響的，是東亞的朝鮮、日本、琉球、安南等等，而西邊，是中亞和南亞諸國。那個時候的所謂「中」和「西」還不大成爲問題。

爲什麼中國人常常忽略鄰居而關注遠客？爲什麼學者總是「中」「西」比較，而不太像日本、韓國學者那樣，習慣考慮「亞洲」這個空間和概念？這是有它的背景的。

第一個背景，它和中國傳統的天朝大國觀念有很大的關係——當然，我並沒有說這是一個好的觀念，這種自大的觀念是有它的問題的——由於長期以來作爲朝貢體制的宗主國，那種歷史記憶在中國人的心目裏是很深的。特別是在晚清以後，中國在嚴重的民族危機中，恰恰被逼出激烈的民族情緒，因此要凸顯中國中心的意圖就十分明顯。所以，一般來說，他們不太願意去談論亞洲。儘管有些日本學者用孫中山的例子來證明「亞洲主義」在中國也曾得到呼應，但是請大家務必記住，這有點兒是一廂情願。孫中山當時講亞洲主義的背景，是當時他在神戶，並且有求於日本，而且是日本人要求他講這個題目。所以，歷史上總是自居大國的中國人，通常不太會把亞洲當作一個天經地義的共同體、或者是一個文化區域。這是一個背景。

第二個背景，跟中國特殊的，即晚清以後廢除科舉進入現代西方學科體制有關。大家都知道，中國的歷史學自從進入現代大學體制以後，很快，就徹頭徹尾的接受了一些區隔的觀念，尤其是大陸的大學。歷史系分世界史和

中國史，可世界史不管中國史，中國史不管世界史，我們是「沒有世界的中國史」和「沒有中國的世界史」。譬如現在有很多學世界史的人，洋文講得很好，西方的事情也知道的很多，可是對於中國卻不怎麼瞭解，於是，就像洋人編的《劍橋世界近代史》一樣，世界近代史裏看不到中國的身影。而中國史的研究者呢？也不太懂世界史或者亞洲史，像週一良那樣兼通中西的學者太少，好像都被「專門化」了，鐵路員警，只管一段。所以我們說，確實我們存在學科體制的問題。

還有第三個很重要的背景就是，我們中國人也許有一個觀念，就是我們總覺得，日本和朝鮮和我們是同文同種，他們都是學了我大中華的文化，是吃一個奶媽的奶長大的，說明了中國也就說明了他們了，其實這是不瞭解日本和朝鮮，中國和日本、朝鮮的文化差異，未必比中國和法蘭西、英吉利的文化差異要小。地理的接近不能證明文化的相似，歷史上的文化交流，也不能證明現在文化上的一致，特別是經歷了近幾個世紀的天翻地覆，更不能停留在漢唐時代來想像異國。

所以，你如果說「亞洲」這個概念的話，中國即使有研究亞洲的學者，通常他也在一個不包括中國的亞洲史裏面。反過來看日本，日本長期以來形成了一個學科傳統：從明治以後，他們的歷史研究是三分天下：西洋史、東洋史、本國史（日本的歷史學科分佈與中國不太一樣）。這個「東洋史」在很大程度上，雖然和我們所說的亞洲史即沒有日本的亞洲史可以重疊，但是，他們的東洋史和本國史又始終分不開。我想這也有三條原因：第一，在文化傳統上，日本一直離不開緊靠著它的中國和朝鮮——當它回頭東望的時候只有茫茫的大海，而西面則有隔著對馬海峽的朝鮮以及龐大的中國。所以，它一直離不開後兩者，即使他們在書寫自己本國史的時候，由於這種密切關係的存在，研究日本史的人多多少少要知道朝鮮和中國的歷史，這是它的傳統。第二，自從江戶時代以來，日本人爲了確立自我，要掙脫中華帝國文化陰影的籠罩，在確立自我的時候，一定要確立自我的對立面即他者。這個他者，在日本來說就是中國，也就是確立「中國跟我是不同的、分開的」這種概念，子安宣邦有一篇文章的題目就叫做「巨大的他者：中國」。過去，很多日本人受到中國影響，觀念上會認爲，日本文化和中國文化是連在

一起的，但是，在確立自我主體意識的時候，首先會把中國、朝鮮與自己分開，只有分開，才能劃清界限，才能確立自己的存在。所以，那個時候就逐漸形成了一個三分天下的情況——對於日本作為他者的「東洋」、跟東洋作為對照的「西洋」、自己也就是在東洋和西洋之間自稱是「中華」的日本。但是，要分開，就得先說明兩者之間的關係，所以反而使東洋和日本的歷史之間，有了糾纏的關聯。第三，從明治以來，日本有一個「脫亞」的思潮，但是，脫亞很難，「入歐」也是入不了的，到現在也是如此呀，即使它可以參加西方八國會議，人家也不大把它看成是真的西方。入不了怎麼辦呢？在十九世紀末打敗中國、二十世紀初打敗了俄國以後，日本的心裏面很自豪，因為不僅過去強大的中國，連西方諸強之一俄國也為我所敗。但是，當他要取代俄國在中國東北的霸主地位的時候，發現自己受到一系列的抵制，甚至連法國、英國都不允許他取代俄國的地位。於是，當時有一個人叫做德富蘇峰，就大哭，很悲傷，沒想到折騰了半天，日本還是被歐洲排除在「西方」的外面。於是，此時日本出現了一個反向的運動，叫做「亞洲主義」，就是強調自己同亞洲的連帶關係。這其實就是後來「大東亞共榮圈」思潮的一個前身。既然入不了西方，倒不如在自己已經比較強大的情況下，聯合亞洲其他國家組成一個聯盟，自己做「盟主」（めいしゅう），同英美等西方世界對抗。這就如日本在二戰侵華戰爭中所打的旗號一樣，「將中國從英美的殖民統治下解救出來」。可是，在這裏面就有一個亞洲或者東亞誰是盟主的問題，日本人當然的認為自己是盟主，由此，日本就產生了所謂的「亞洲主義」或者說「亞洲連帶論」。當時就有許多日本學者跟著當時的政治思潮而產生了一種要把亞洲作為一個空間來研究，建立一個亞洲文化或者知識共同體的一個想法。

最近這些年來，我感覺到特別麻煩的是這樣一件事情。日本、韓國很多學者，幾乎可以說是主流學者，在書寫歷史的時候，研究文化的時候，都喜歡用「亞洲」這個單位。從宮崎市定以後，他們就特別愛講「アジア史」，這簡直成了風靡一時的東西。到了九〇年代，在韓國、日本和中國，就出現了一個高峰和熱潮。比如說，在中國大家都比較熟悉的像溝口雄三這樣的學者，他和其他日本學者主編了一套影響很大的書，一共七冊，叫做《アジアから考え》即《從亞洲出發思考》，同時，日本和韓國學者又寫了一系列以

亞洲或東亞為主題的書。大家記住，這個時候說的亞洲，實際上就是東亞。可是，日本和韓國學者的這一些做法和想法很有吸引力，現在有一些中國大陸的、臺灣的、香港的學者，也去談論亞洲和東亞。我當然理解，用亞洲作為一個空間單位來研究歷史，有一個好處，就是它超越了民族國家的局限性，這是它的好處，我們也承認它的意義，但是也要注意，在談論這個「亞洲」或者「東亞」的時候，人們也很容易忽略一些歷史問題。

所以，下面我們就來講一下我對這個「歷史問題」的看法。請注意，在標題上，我們用「十七世紀中葉」這個詞語，實際上講的就是滿清帝國。滿清帝國是一六四四年建立的。

參、明以後無中國：朝鮮人這樣看清帝國

我們首先來看朝鮮。下面是一個朝鮮使者來中國寫的詩：「自古中華帝者都，只今回曩涕空雙。山川不是陵為穀，風景殊非河異江。萬代衣冠終泯滅，百年流俗盡蒙喪。夜來僧舍愁無寐，月滿空庭風打窗。」在他的詩句裏，過去的北京還是「帝者都」，用「帝者都」這個詞，無論在文化上還是政治上，還是認同中國就是明帝國的。但是，大家看到詩中提到：「萬代衣冠終泯滅」，這就不同了，為何朝鮮人會這樣說呢？這便是下面要說的故事了。

最近，我花了很多時間來看《燕行錄》，而《燕行錄》就是朝鮮使者到中國來出差，寫的日記、散文或詩歌。這種日記是非常細緻的。現在的韓國學者和日本學者已經編了一共一百零六冊。其中明代的有一些，主要是清代的，滿清帝國在一六四四年建立以後，這兩三百年間，正月、冬至、賀歲時以及皇帝生日等等時間，朝鮮的使者要到北京來朝賀，他們對中國的觀察，非常仔細，仔細到讓人簡直不能想像的地步。同時，這些資料非常的多，現在有一百卷是韓國教授林基中他們自己編輯出版的，還有六卷是日本學者，京都大學的夫馬進教授搜集了在日本保存下來的《燕行錄》。我看過其中的大部分後，有很深的感觸。給大家講幾點——我姑且舉些例子來講。

第一點感受非常深的是，他們對滿清，從文化上是很蔑視和仇恨的，鄙夷之心簡直是不得了。那鄙夷表現在哪里呢？舉一個例子，很簡單，就是看你穿什麼衣服，是什麼打扮。因為衣服是一種民族、傳統和文化的象徵物。

說起來，歷代中國政府對朝鮮是另眼相看的，為什麼呢？古代中國王朝歷來認為，周邊蠻夷之中，最接近中國的，就是朝鮮，是化外之人裏面最化內的人——也就是說，是野蠻人裏面最文明的。大家看到，當各種《職貢圖》畫朝鮮國的官員的時候，這個衣服、官帽、袍子，都很像明帝國的。確實是這樣，為什麼呢？因為朝鮮人在明代的時候，不止是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也認同明帝國。他們認為，明代的漢族政權象徵和代表著中華文化，所以不止政治上臣服，在文化上也認同。他們在穿衣服上，完全模仿的是漢族人，也就是大明衣冠。大家看《皇清職貢圖》上的「高麗國民人」，朝鮮的老百姓即使沒有帶烏紗帽，他們穿著的也是漢族的衣服。

可是，當朝鮮朝貢使者到滿清帝國來出差的時候，他沿路所有看到的人都是梳著辮子、穿著滿清衣服的，於是他心裏馬上產生了一個感覺：這一國的人顯然已經變成夷狄了，因為他們穿的都已經是夷狄的衣服了嘛。這些朝鮮人有時也很刁鑽，我可能看到過《燕行錄》裏面有上百處這樣的記錄和描述，朝鮮使者到中國，總要故意問漢族人，「你們看我們穿的衣服怎麼樣？」這些穿著滿清衣服的漢族人就比較不好意思。他們接著還會再追問，「你們知道我們穿的是什麼衣服嗎？」這些漢族人就很尷尬了，只好說「這是前朝的衣冠。」朝鮮人接著說：「你們怎麼不穿呢？」怎麼回答呢？漢族人無可奈何，就只好說，「遵時爾。」所謂「遵時」就是遵守時王之制。可這個時候朝鮮人就特別自豪。自豪背後，就是深深的鄙夷，就是對漢族中國人的特別鄙夷，非常瞧不起漢族中國人。為什麼？你們這些人已經是野蠻人了嘛，因為你們穿著野蠻人的衣服。

當然，他們也非常敏感地注意到三種情況下，人還在穿漢族服裝。第一，除了遺民之外，還有在戲臺上的演戲人也穿大漢衣冠。朝鮮使者諷刺中國人說，這種明明是很正式的莊嚴的漢族衣冠，竟然變成了戲臺上的玩意兒，「大漢冠服，盡成場戲之裝」。但是，他又反過來一想，這也許是漢族中國人不得已的計謀，把「大漢遺志」保存在戲臺上，恐怕是保存民族主義

的一種方法吧。第二，婦女還穿漢裝，大家都知道，清朝有「男降女不降」之說，男的都必須剃頭、穿滿族的衣服。可是女的呢？好像還是可以保留舊時裝束的。於是，朝鮮人就注意到中國文化現在果然完蛋了，男的都完了，只有女的還保留著大漢傳統，恐怕這是將來「以陰覆陽之兆也」。還有第三是什麼？他們很自豪，那就是朝鮮、安南、琉球等等外國使者。他們想，朝鮮、琉球、安南出使到北京的使臣，穿著大明衣冠招搖過市，等於在給漢族中國人昭示，你們的祖先是這個樣子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家可以想像，當他們穿著大明衣冠到滿清帝國裏來的時候，他們的心裏充滿了對自己文化的自豪，和對滿清帝國文化的鄙夷。這種鄙夷，不止包含衣服，還包括他們的政治意識形態——正宗的程朱理學。

朝鮮人的固執大家應該已經有所耳聞，直到現在，朝鮮人令人敬佩的和讓人生氣的，都是這一點，他們固執的不得了。但是，他們堅守程朱理學是堅決不動搖的。到了中國來一看，發現風氣大變，所以，他們左邊把「王陽明之學」批一通，右邊把流行的乾嘉考據學批一通，只有「我們的」程朱理學是最正宗的。爲什麼呢？有一個很簡單的原因，朝鮮當時有「兩班制度」。兩班制度是什麼呢？就是在朝鮮人中，只有世家子弟才有參加科舉的權力。只有世家子弟可以參加科舉考試，就形成了一個階層，這個階層由於不大流動，形成一個特權階層，特權階層的自豪和自負，使他們對自己的文化和經驗捍衛特別固執。他們堅持說，你們清帝國根本不是程朱理學，我們這個才是真正的「朱子之學」。不管當時中國的士大夫怎麼跟他說，他總是認爲，天下最好的就是程朱理學，朱子之學要始終堅持不動搖。

特別是，他們看到了中國的禮崩樂壞現象，覺得這就是中國程朱理學敗壞產生的結果。他們看到的主要是什麼呢？第一，喪禮用樂，這個在《朱子家禮》中是沒有的。所以，朝鮮人從現在的義州、鳳凰城經遼東過來。一路上看到的都是吹吹打打的喪禮，就非常生氣。按照他們的理解，喪禮要寄託人的哀思，怎麼能夠吹吹打打呢。這就是倫理淪喪，程朱理學沒堅持好的結果。第二，他們沿路看到，很多佛教的寺院和關帝廟，比孔廟還要莊嚴輝煌，他也很生氣，認爲這是由於夷狄主政，不能堅持儒家正宗理學的緣故，這倒不是冤枉，因爲滿清在入關以前，就相當崇拜關公，莊吉發有一篇文章

就講到，努爾哈赤和皇太極都愛看《三國演義》，所以在天命年間（1616-1626）在遼東就建了廟祭祀關公，到了乾隆年間，朝鮮使者經過的盛京即遼東地區，竟然有九十座關帝廟。第三，他們特別看不慣的是男女無別。他們看到，滿清帝國裏怎麼會女主人坐在車裏面，男的奴才在前面趕車，而且居然可以回頭和女主人聊聊天，他看到這種情況，就非常生氣。用我們現在流行的觀念來講，這是男女平等啊、社會進步了，可是在他們堅持的傳統觀念看來，男女授受不親，這是倫理崩潰，滿清王朝的一般民眾在這一點上，可能確實沒有十分嚴格的界限。第四，士人從商，這在我們現在看來也是一個進步。但是，當朝鮮使者——這些使者當然都是士大夫——看到連大學士都去經商，他們就很不屑。所以說，中華文化淪喪已極，而且「明以後無中國」，爲什麼沒有「中國」？這個「中國」在他們心中就是「中華文化」，他們覺得，到了清代，文化已經淪喪。

再舉兩個有趣的例子。

一個是薊州城外的安、楊廟，當每個使團快到北京的時候，都要經過薊州，他們總看到一個不能容忍的事情，那就是，城東的山上有安祿山的廟，這本來就已經不對了。按照傳統觀念，安祿山是反抗大唐王朝公然造反的逆臣。但是，更不可思議的是，人們竟然在旁邊再造一座楊貴妃的廟，把傳說裏的安李曖昧關係，居然變成公開祭祀的合理關係，他們就很憤怒，在他們的日記裏、詩歌裏憤怒地抨擊這個怪現象。

另一個有趣的是關於江南女子季文蘭的故事，據說一個叫季文蘭的江南女子被滿族將軍王章京擄去瀋陽，而這個季文蘭是江南虞尙卿秀才的老婆。她在經過離北京不遠的榛子店的時候，在牆壁上寫了一首詩：「椎髻空憐昔日妝，紅裙換著越羅裳，爺娘生死知何處，痛殺春風上瀋陽」。這是一個悲悲切切的故事。這首詩寫在牆上，到康熙二十二年，朝鮮使者金錫胄看見了，非常同情這個女子，和了一首「綽約雲鬟罷舊妝，胡笳幾拍淚盈裳。誰能更有曹公力，迎取文姬入洛陽」。他想像這個季文蘭的故事，是滿清滅掉明朝時，滿人殺死了她的丈夫，又把這個女子擄到瀋陽去了。可是，幾年以後，這堵有詩的牆已經沒有了，但每一個朝鮮使者路過，都要想像著去題詩，越來越多，都是想像一個美麗女子被擄到野蠻的滿族地區瀋陽去了。這

是一個國破家亡、妻離子散、生離死別的故事。至今留下了上百首詩，而且越寫越玄，越寫越動人，故事越寫越多，最後一直想像到這個女子到了瀋陽，被這個王將軍的大老婆欺負得幾乎要投繯自殺。

可是這個故事，請大家記住是錯的。爲什麼是錯的呢。首先，她題詩那一年是戊午，可是戊午這一年是哪一年？難道是明代萬曆年間的一年？可那個時候並沒有在江南打仗呀。實際上，這個戊午是康熙十七年，這時候的戰爭，是康熙和吳三桂的戰爭。其實，有人已經很明確的透露了這個消息，顯然這個季文蘭的丈夫是吳三桂的部下，她是敗軍之將的夫人，所以，這根本不是明清易代時的一個家國悲劇。可是，一直到同治、光緒年間，還有朝鮮使者照樣在寫這種想像的詩，借此諷刺和抨擊大清帝國。其實，朝鮮人自己很早就發現這個問題了，他們也知道這個「戊午」不對。但是他們視而不見，仍然固執地把它想像成明清易代的悲劇，堅持這種想像，頑固的想像另一個帝國的悲情，是在幫中國漢族人想像一個悲情故事，儘管中國人早就沒有悲情了，可是朝鮮人還是在幫你想像，他們說，漢族人好悲慘，「痛殺春風上瀋陽」。所以，「明以後無中國」，他們就自命爲「小中華」，「吾東方自箕子以來，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風，女有貞正之俗，史稱小中華」。在很多文獻裏，他們就這樣，在反反復復描述一個蠻夷的中國和文明的朝鮮。

康熙五十六年，一個叫做高時彥的朝鮮人在給通文館冽泉樓寫序的時候，說了一段很長的話，說朝鮮在文化上仰慕中華，「上自學士大夫，下至委巷之賤，莫不知尊周之爲重，以血誠服事皇明數百年。至龍蛇之變，受神皇再造之恩，浹人骨髓。一自滄桑變易，陵穀貿遷之後，華夏文明之地，變爲腥穢之區，數千里箕封山河，亦帶牛後之恥。義人志士，掩抑悲傷，低回慷慨，常抱朱夫子所謂含怨忍痛四字於腸中者多矣」，這段話一是講了對大明王朝的認同不止是文化仰慕，也包含萬曆從日本手中拯救李朝的政治感恩，二是說了明清易代以後，對於以夷變夏，甚至連累而及朝鮮也要朝拜滿清的恥辱感，三是表達了一種躍躍欲試的恢復之心。這大概很能代表朝鮮士大夫的想法。大家想想，在這個時候朝鮮還會有對中國的文化認同嗎？大家知道，朝鮮李氏王朝有一個三報壇，祭祀的是明洪武皇帝、萬曆皇帝和崇禎

皇帝，這個壇一直保存了很久很久，甚至清朝已經建立了近二百多年，他們還一直在祭祀明朝皇帝，他爲什麼這麼懷念明朝，難道僅僅是政治上的感恩戴德嗎？

肆、華夷變態：日本人這樣看清帝國

那麼，再來看日本。

在日本鎖國時代，日本人瞭解中國的一個視窗就是長崎。因爲是唯一合法的通商港口的緣故，在長崎留下了很多有關中國的資料。大家要注意，日本人對中國人資料的搜集是無與倫比的，一直到現在還是如此。中國人的大國心態太嚴重，總覺得日本只是撮爾島夷，不必掛齒，可是日本卻不是，僅僅是《華夷變態》，它就記載了順治元年（1644）到雍正二年（1724），一共八十一年之中二千三百多份記錄。當時，在長崎，只要有來自中國的船，日本官方就要訊問和記錄，這記錄叫做「唐風說」，就是用來瞭解中國的，讓你來彙報中國的情況如何。他們通常問的問題是什麼呢？大約有二百多個，可是，常常問的裏面，有「有攻擊他國增廣土地之意耶」、「宰相之外，有器識雅量之人乎」、「何省何所爲重」、「防日本何處爲要」、「防外國之大略爲何」、「古今共傳要地之事情如何」、「風俗人情有何變異」等等。

那麼，這書爲什麼叫《華夷變態》？就是他們認爲，清帝國由華變成了夷。記這個由華變夷的歷史的《華夷變態》，主要就是根據對來長崎貿易的清人的筆訊記錄而成的，二千三百多份記錄，再加上《唐通事會所日錄》、《古今華夷通商考》等等，這些資料很多很多。日本人關心的很多問題都在這裏面。比如第一卷的《大明論》就是當時明帝國遺民寫的，日本人關心明朝到底怎麼樣呀。那麼，清到底怎麼樣呢，裏面又有《清夷論》。在這裏面，有關於康熙皇帝南巡杭州西湖、有湯斌如何以儒家學說教導太子、有滿族統治如何用漢土遺俗、有各省如何辦學、有哪里災荒和海嘯，連雍正的硃批論旨都知道，我們從這些資料裏就可以看到，當時的日本人對中國的瞭解

非常之多之細。我總覺得，日本人對中國的瞭解一直是非常細緻的。從《華夷變態》，到後來清末由日本外務省編的《清國事情》，細緻到那種程度，我們都覺得太震撼了。就是說，他對我們什麼都知道，我們對他們什麼都不知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一明一暗之間，差別就大了。大家可以看到，從《華夷變態》到《唐通事會所日錄》，到後來南滿鐵路株式會社的各種調查報告。日本人對中國保持了高度的關心，就是在這種關心基礎上，日本人對當時的中國很瞭解，而在這個瞭解的基礎上，他們也對清帝國的文化產生了極度的鄙夷。

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他們和朝鮮人一樣，覺得「大清太祖皇帝自韃靼統一華夏，帝中國而制胡服」，所以，明清之間中國已經從文明國家變成了野蠻國家了，中國從衣服、音樂，到禮儀之制，基本上都已經蠻夷化了。所謂蠻夷化，就是說，日本人覺得中國已經從漢族文明變成了滿族制度。有一個南京船的中國人船主，看來是很有一點兒文化的，由於意外事故漂流到了長崎之外的日本岸上，有一個日本文人和他交流，對他說：我這裏有一件衣服，你來看看呀。並問，這是什麼衣服？他不知道。日本人就教導他說：「我邦上古深衣之式，一以禮經爲正。近世以來，或從司馬溫公、朱文公之說，乃是此物」，用現代話說，就是這是古代中國的深衣之制啊，司馬光、朱熹一直堅持的文明服飾，難道你們中國人不知道？然後，又戴個帽子給他看，問：這是什麼帽子？也不知道。日本人說這是「程子冠」，他們很驚訝，連程頤、程顥的「程子冠」，你們竟然也不知道？又有人問，那麼，你們的朝廷宗廟之樂是什麼？這次中國人擔心受到諷刺，便朝古老的歷史講，說我們朝廷是唐代的音樂，祭孔是周代的古樂。但日本人追根究底，認爲他們有意掩飾，說在滿清皇帝之前怎麼會奏周樂，明明是蠻狄之樂。特別是日本人哪壺不開提哪壺，動不動就故意問漢族船員，你們的辮子是怎麼回事？並且常常講「貴邦之俗，剃頭發，衣冠異古，此何得謂周公之禮？」弄得清國人很尷尬，只能含含糊糊地繞著彎高掛免戰牌。

第二個，文獻裏面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有些日本人很刁鑽地追問當時中國商人，滿清皇帝是哪里出身的人？一些中國人被他們追問不已，情急

之下便撒謊說，我們中國的皇帝是江南人。可日本人不依不饒，故意揭穿他們說，聽說皇帝是出身在長白山呀，長白山在江南哪個州啊？於是，中國人只好解圍說，先生博學多識，于中國書無所不通。你今天問起這件事情，我們不好說。不過，這件事情呀，對別人不能說，可告訴你沒有關係，你不要告訴別人。我們的那個皇帝，確實是長白那一帶的人。原本以為到此結束，沒想到日本人更得寸進尺，接著說了一個更讓中國人難堪的傳說，據說在奴兒幹地方有一個習慣，要貼祖宗的像。據說滿清皇帝的祖宗是姓源的後代，就是《源氏物語》的源氏的後人。這個意思，在我們看來就好像是說，「日本人是中國皇帝的祖宗。」結果逼得一個中國人朱柳橋只好承認說，「我們也聽說了，他好像是日本人的後代，是姓源，據說康熙皇帝自己也說過的。」

整個清代，雖然有鎖國的政策，但是由於長崎的通商，日本人對於中國的想像和知識還是不少的，大家可以看三個資料，一是寺島安良《和漢三才圖會》（1712），一是長崎唐通事川忠英編的《清俗記聞》（1799），一是岡田玉山的《唐土名勝圖會》（1805），可是在文化上，日本越來越對漢唐中華留有美好回憶，而對現實中國有一種實際鄙夷。十七世紀後期的《鵝峰先生林學士文集》裏面有一篇《吳鄭論》，裏面說，「韃虜掠華，殆四十年，……本朝升平，西海波穩」，這是一個對比，在日本人看來，大日本有著光輝的歷史，所謂「邃古神功皇后征三韓，光燭海外，至今千萬歲，一姓連綿，生民仰之，可不謂至治哉？」而中國呢？用他們的話說，「今也，先王禮文冠裳之風悉就掃蕩，辮發腥膻之俗已極淪溺。則彼土之風俗尙實之不可問也」。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人怎麼會瞧得起滿清帝國呢？可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時代，當清帝國還是在朝貢體制的想像當中大而化之地去瞭解日本的時候，日本卻非常瞭解中國，在他們心目中，因為他們堅持的是漢唐中華文明舊制，所以，他們認為，日本才是正宗的中華。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就對滿清帝國的文化越來越多地生出了鄙夷之心。

伍、十七世紀中葉以後：東亞認同的崩潰

那麼，我們現在再來看，這個東亞文化圈在十七世紀中葉以後還存在不存在？我們先來看日本。

自從十五世紀足利義滿以來，雖然對馬藩曾經盜用「日本國王」名義進貢中國，但是足利氏已經不再對中國進貢了，而豐臣秀吉在一五八七年——一五八七年在日本的歷史上是很重要的一年——發佈了驅逐天主教士的命令，宣佈日本是神國，並且在一五九二年出兵朝鮮，這就是著名的「壬辰之變」。這時候的日本已經完全不顧及明帝國的威勢，開始了東亞爭霸的征途。豐臣秀吉在一五九六年乾脆拒絕了明王朝的冊封，並且非常明確的宣佈，要建立一個以北京為首都的大帝國。豐臣秀吉一五九二年打到朝鮮，和後來明朝的皇帝萬曆派去救朝鮮的中國軍隊，打的一場糊塗。後來，只是因為豐臣秀吉病死，日本人才退兵。在此之後繼承他的是德川家康和德川家光，日本進入了幕府時代。德川家康這些人，他們逐漸統一了日本，國力開始強大，不僅要求和中國對等貿易，而且實際上對當時中國更有不屑的心思。即使是那些讀中國書讀的很多的文化人，也對中國產生了一種要分庭抗禮的想法。特別是當滿清打敗明朝，入主中原之後，當時中國曾經有黃宗羲、鄭成功等等，多次去日本乞師，就是請求軍事援助。那個時候，德川家光曾經非常想幫助明朝遺臣打擊滿清，這也是一種爭霸。只是當時有人覺得不可輕易出兵，務必三思而行，在猶豫之間，當他幾乎決定要出兵的時候，在福州的唐王政權被打敗了，鄭成功退到了臺灣，這個時候他才放棄了出兵中國的計畫。所以，在這時，很多日本人都已經對滿清有很大的敵視了，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看日本非常有名的近松門左衛門編的一個戲劇《國姓爺合戰》。它想像的就是一個日本人的後裔，為了恢復民族權力，憤而起兵。這個日本人後裔就是鄭成功。大家可以看，當時很多日本的學者對中國是很不屑的。大家知道，按照丸山真男的研究，日本近代思想史是朱子學、古學、到國學這個逐漸「去中國化」的脈絡，但是，即使是最初的朱子學者，也說對中國很不屑的話。比如說林羅山，他的兒子就是《華夷變態》的編者，他在序文裏就說得很清楚：「崇禎登天，弘光陷虜，唐、魯才保南隅，而韃虜橫行中原，是華變於夷之態也」。另一個叫做山崎闇齋的朱子學

者，曾經和學生討論，我們現在尊奉孔孟，可是，如果現在中國以孔子為主帥，以孟子為副帥來打我們，我們怎麼辦？大家七嘴八舌的討論，他就說：我告訴你們，要一鼓而擒之，這樣我們就是真孔孟。而古學者山鹿素行，在《謫居童問》中，也曾經說應當將日本稱為本朝，把清帝國稱為「異朝」，在一六六九年編的《中朝事實》又強調，應當把「本朝」當作「中國」，這是「天地自然之勢，神相生，聖皇連綿」。因為他們是萬世一系，文化文明是綿綿不絕的。到了國學派起來的時候，這些人提倡國學，實際上就是去古典中國化，所謂國學，就是日本自己的學，日本固有的學問。這時，其實就已經確定了日本學說高於原本所崇尚的中華學問這樣一個階序。

接著來看朝鮮。儘管在整個滿清帝國時代，朝鮮表面上都向清朝朝貢，但是這是政治上的臣服，朝鮮上層文化人從心理上對滿清帝國的仇恨從來沒有消失過。我們看一個例證，現在在韓國的首爾（也就是漢城）有一座碑，這個碑叫「大清皇帝記功碑」，過去也叫做三田渡碑，因為過去它立在漢江邊上一個叫做三田渡的地方。這座碑是一六二七年皇太極打敗朝鮮人、迫使他們簽定城下之盟所立的碑，這個碑裏有一句話很刺激人，意思是你投降，讓你保全，不然，就統統殺了你們。大家知道，朝鮮人曾經因為萬曆皇帝派兵在日本豐臣秀吉手裏救過他們，所以一直非常感激明朝，但是，對於打敗他們的皇太極以及皇太極的後人，卻一直是非常痛恨的。這就是為什麼朝鮮人一直對滿清懷有刻骨的仇恨的一個原因。在我看《燕行錄全集》的過程中，看到幾乎到處是蔑視和辱罵清帝國禮崩樂壞、道德淪喪的話，這樣，雖然在政治上仍然承認大清帝國的宗主地位，在文化上，對中國的認同就漸漸變化了。大家再可以看三個小故事，第一個，過去朝鮮人承認殷商的箕子是他們的祖先，可是，後來慢慢變成了說祖先是檀君，有興趣的人可以看白鳥庫吉的有名的論文《檀君考》和李光濤的論文《箕子朝鮮》。大家知道，歷史學的一個重要責任，是建立歷史傳統和文化認同，這最重要的是尋根問祖。這種認同的方法之一，就是確立一個神話人物當民族共同的祖先，朝鮮人漸漸多談檀君而少談箕子了。因為箕子是殷商朝，也就是中國古人，為什麼要奉一個「外國人」作祖先呢？這道理容易理解。第二個故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三田渡記功碑。臺灣的陳捷先教授曾經考察過近代韓國一個很有趣的歷史，這個記功碑在一九五二年被大韓獨立青年團砸過，因為是朝鮮的

恥辱嘛，所以一九五五年，被李承晚政權下令推到漢江裏面，朝鮮人很痛恨這個記載著恥辱的東西。直到一九五九年，李承晚政權說是要保護文物，才又把它撈上來，安放在松坡洞，作為國家文物一〇一號，成了一個提醒民族記憶的恥辱柱。你說這是不是很能反映朝鮮民族的民族意識？第三個故事，是一九九三年我去韓國訪問的時候，曾經到過漢城奧運會組織者之一金集的家，他聽說我懂一點歷史，所以在那裏就老是問我，《好太王碑》如何如何，我們朝鮮跟日本的歷史誰長？這是很民族主義的話題，其實他要提醒我的，是朝鮮歷史的久遠和獨立，大家只要想一想近年來韓國和中國之間，關於「高句麗」的爭論就知道了。

陸、結論：地雖近而心漸遠

顯然，從歷史上看，簡單地談論「亞洲」或者「東亞」，把亞洲或東亞當作一個不需要歷史論證的、似乎現成的共同體，會產生一些很難解決的問題，是什麼問題呢？

第一個問題是，它想像了一個具有共同性和同一性的亞洲，而忽略了亞洲和東亞的內在差異。中國、朝鮮和日本是很不一樣的，他們的差異可能比中國和英國、中國和法國的差異更大，未必中國和日本的差異就小——我們不可以用黃皮膚、黑頭髮這樣的表面現象去想像文化，文化和人種是兩回事——所謂「同文同種」，是很有疑問的。

第二個問題是，它忽略了東亞的歷史變化。實際上東亞文明的「一體性」，常常只是想像中的漢唐中華的時代。我們通常講儒家文化圈、漢字文化圈這一類的概念，卻常常忽略了實際上從漢唐以來到明清，歷史是在不斷變化的，這些國家、這些民族的文化，是在不斷的變化的，漢唐時代共同接受的中華文明，到了宋元明清時代的朝鮮、中國和日本，恐怕已經漸漸演化成了各自的文化。如果說，過去曾經有過一個共同基礎的話，我們可以相信西島定生等人的說法，文化認同是建立在漢唐中國文化的法律、文字、儒家

觀念、佛教等等共用的文明基礎上的。可是到了明清以後，真的還有這個認同嗎？

第三個問題是，當我們想像一個亞洲或東亞的同一性的時候，它就會帶來一個新疑問，怎麼解釋在同一性文化中間的這三個國家——中國、朝鮮和日本——在進入所謂全球性的近代的時候，它們的經歷和路程是不一樣的。所以，包括我在北京大學的「東大論壇」上的發言（論壇的題目是「亞洲視野中的中國學」），我就一直在講，我同意用「亞洲視野」這個詞，但是，亞洲視野只是中國研究的背景，就是說，研究中國學的人在考慮問題的時候，是要考慮到亞洲這個背景，要用這個背景來解釋一些問題，但是，並不是用亞洲來取代中國。實際上亞洲和遠東一樣，原本是來自歐洲的一個地理描述。它並沒有文化上的天經地義的聯繫性。遠東這個詞，是歐洲人在描述整個地球的時候，一個空間單位——只是一個地理意義上的空間單位而已。而在文化上，我們就必須講清楚一個問題：實際上，所謂同文同種的東亞，表面好像有一個認同的，不言而喻的基礎，可是事實上，在十七世紀中葉以後，這個歷史與文化的認同基礎已經崩潰了，否則，你怎麼來理解中國、韓國和日本現在這種彼此的小心、偏見和敵視。

所以，我的結論是，在十七世紀以後的三百多年中，由於歷史的變遷，在文化上，東亞三國實際已經分道揚鑣了，過去也許曾經有過的文化認同，只是在漢唐時代才曾經有過的，而現在只是在歷史記憶中存在，它的基礎已經隨著東亞權勢的變化而崩潰了。說起來，那個時代裏，只有清帝國還固執地維持著這種朝貢體制的想像，想像著「萬國來朝」的景象。所以，在東亞三國的觀念世界裏面，十七世紀以後，根本就沒有什麼文化上的「東亞」，充其量也只是一個地理上的「東亞」。在我看來，日本學者也好、韓國學者也好，要談論亞洲認同，要談論亞洲共同體，就需要考慮以下這些問題：歷史上是否真的曾經存在過一個有著天經地義文化認同的東亞嗎？從歷史上看，亞洲何以成爲，或者什麼時候成爲過一個可以互相認同的文化共同體？日本、韓國所認同的「亞洲」，是不是中國也認同的那個亞洲？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善意的理解日本和韓國學者的關於亞洲作爲歷史研究和文化認同的

空間的話，那麼我們就要問一個問題：「這個共同體是過去一直存在的東西？還是我們需要建設的東西？」我想，實際上恐怕是後者。

最近這些年，「亞洲」或者「東亞」這個詞很常見，經濟學家熱心地討論東亞各國之間的經濟互補性和經濟一體化的可能性，政治學家又常常討論一個作為可以與歐洲相比美、和美國相抗衡，用一個聲音說話的亞洲政治共同體，歷史學家則由於區域研究的風氣，常常希望超越民族國家的邊界，來討論東亞或亞洲歷史，而文化研究者則覺得，最好有一個可作為西方文化「他者」的「東方文化」或者就是「東亞文化」。這些想法當然各有各的意義和價值，但是我今天給大家的報告，則是希望討論一個歷史問題，而不是現實問題，雖然這個歷史問題也會影響到現實，這就是從歷史上看，十七世紀中葉以後的中國、朝鮮、日本之間，在文化上已經互相不認同了。需要說明的是，我並不簡單地反對這個經濟、政治、文化或者知識共同體，但是，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覺得首先要講清楚的是這幾百年的歷史，應當說，過去東亞的對於所謂中華文化的想像和認同，只不過是漢唐時代的那個中華，連這個想像，到了十七世紀以後都沒有了，因此，未來如果能夠建立一個東亞共同體，它的文化認同基礎是需要重建的。正是因為這一點，我和一些日本、韓國、中國大陸、臺灣學者也許意見有分歧，當然，我能夠理解他們的心情，包括理解他們聽了我的這個意見之後，心裏產生的不愉快感。◆